



〔德〕克劳斯·施拉普纳著

洋教练自述

東方出版社

场边指导

荣获泽普·赫贝格奖

李健鸣等译

〔德〕克劳斯·施拉普纳著

足球教练的自述

东方出版社

“施拉皮”叔叔做指导

在自己的车间

施拉普纳夫

SCHLAPPNER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
转载、翻印，违者必究

洋 教 练 自 述

YANG JIAOLIAN ZISHU

著者/[德]克劳斯·施拉普纳(Klaus Schlappner)

译者/李健鸣等

责任编辑/刘立群

封面设计/尹凤阁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92,000

版次/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316-3/K·22 定价 3.40 元

亲爱的读者、亲爱的球迷们：

我首次中国之行是同一支德国球队——曼海姆瓦尔德霍夫队来华，那是参加1984年的长城杯足球赛，我们获得冠军。一年后我邀请中国的两名教练和一名翻译来德国进修，他们在我那里学了三个月，并且没有白学。以后他们带的队在中国国内比赛中曾获得冠军。听到这些我十分高兴。

现在我从德国来到中国，肩负着训练中国足球队的任务。

对，我的任务是抓训练，选拔运动员，负责中国足球队的工作，不断提高它的水平。面临各种大赛，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但我会竭尽全力，尽快让你们见到队伍的变化。

当你读这本书时，会了解到我在体育和日常生活方面的许多看法，教练工作也不能没有一般的生活，因此我在中国不仅关心体育，而且更关心人。

愿这本书给大家带来欢快！

你们的 克劳斯·施拉普纳

1992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致中国读者和球迷

1. 引言：足球是纽带 1
2. 人生旅途：施拉普纳之路 3
3. 青少年足球：少壮要努力 12
4. 业余球员：“小人物”的烦恼 16
5. 面目一新：瓦尔德霍夫队堪为样板 20
6. 日常训练：汗水乃成功之母 49
7. 误入歧途：踢保险球和区域联防 57
8. 比赛：没有固定的模式 63
9. 教练的命运：出头露面之外还要
应日常琐事 71
10. 职业足球：为体育道德辩护 79
11. 足球明星：以球为业，概不仅仅为了谋利 85
12. 来自看台的共鸣：光荣的失败与
不光彩的胜利 88

13. 球迷：要热情，但不要狂热	92
14. 配角与主角：拼搏和创造性的完美结合	96
15. 恢复足球的魅力：充分发挥现有手段	99
16. “黑衣法官”：赛场嘘声在所难免， 裁判水平来自锻炼	107
17. 俱乐部队处于十字路口：官方为绿茵场 上的歌剧提供了什么资助？	117
18. 量入为出：教练应是球队的理财专家	122
19. 新闻媒介：由此而来的烦恼和乐趣	125
20. 兄弟阅墙：围绕国家队的争论	131
21. 国际足坛：从贝利到普拉蒂尼	137
22. 我的呼吁	143
23. 新的历程：执教中国国家队	145
我与施拉普纳	古广明 149
译后记	151

1. 引言:

足球是纽带

“总有一个队会赢它。”——这是我在 1984 年初秋预言的。我并不是指电视台播放的“苦力”节目，我想到的只是总会有一个队能击败拜仁慕尼黑队。当时它已经以 12:0 的优势遥遥领先，甲级联赛显得有些令人乏味。10 月 6 日，我们瓦尔德霍夫俱乐部队走进奥林匹克体育场，以 2 比 1 力克慕尼黑队。我得意忘形，竟把一顶红白相间的慕尼黑队的帽子戴在头上。

必须有这种快乐，特别是在艰苦的、日渐商业化的职业足球赛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足球这一激烈的运动不仅是千百万人的娱乐活动，同时也是一项社会工作。父母亲知道孩子们在俱乐部里做什么，地方政府可以省却一大笔社会福利开支。12 万 8 千支足球队为联邦德国老老少少提供了良好的业余活动场所。年轻人在这里学习如何与人和睦交往，老年人也可以在这里碰头聚会。

每个人对足球都有所了解，很多人都踢过球（或罐头盒），足球的规则也并不复杂。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自觉

意识到，足球能给青年人指明正确的方向。足球应当给人带来享受，是我们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至少我是这样看待我与足球的关系，即便有时情况看上去并非如此……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路德维希港西南体育场一块附属场地上观察一些在那儿踢球的人。他们无拘无束，不属于任何一个俱乐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有组织并分成两个队踢。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有年纪较大的人，也有很小的孩子。

我被他们吸引了，走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

在这个由形形色色的人们组成的球队里，有一个72岁的老人。当他在球场上来回奔跑时，外人根本看不出他的年龄。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有7岁。

我自问，是什么东西驱使我要把这件事写进书里呢？那确实十分特别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只能响亮地回答：“是！”因为这正是足球运动特有的产物。目前，由于各种原因，足球这项运动很有争议。

足球带来一种不寻常的现象：平日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可能年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可在这里，在一只球的游戏中共同享受人生乐趣。他们不是爷孙叔侄，也不一定是和睦的邻里，然而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近于好感、同志式甚至友谊的关系。年龄在这里没有界限，是足球完成了这个创举。

我这样的经历不仅仅限于路德维希港，也不仅限于哪

一个球场，无论在弗伦斯堡还是在罗森海姆，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足球是一种媒介物。拥有共同体育爱好的人们能聊在一起，年轻人学着理解长辈，德国人和外籍人，中小学生和学徒，大学生和工人，都在足球场上一见如故。

我在草坪上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启发了我，使我提出了下列要求，我认为无需多少财政支出就完全可以做到这点，那就是：城市和乡镇应该为那些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愿或不能“有组织地”进行足球运动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可能。他们没有参加某个俱乐部，可能是出于职业的原因，也许是不愿加入某个团体，或许他们认为俱乐部队还不够好。他们只是单纯地想踢踢球，无须注意公众或多或少挑剔的目光。他们只是想休息一下，用踢球来消除整日的疲劳。经过多次观察，我发现足球在这方面有百分之百的功效，业余爱好者们在其中会体会到无穷乐趣。

2. 人生旅途：

施拉普纳之路

清晨6点1刻，黑夜对我来说便结束了。洗漱完毕，钻进汽车，我很快就来到车间。7点整，车间开始工作。我的

大儿子福尔克陪我去车间，他马上就要参加电气装修工的满师考试了。我妻子也不闲着：先是准备早饭，7点钟开始办公，紧接着是一连串的电话、确认合同、约定日程和处理所有商务。

车间里，根据每个安装工的特殊技能分派工作。有的人在我这个1970年创立的企业里已经工作了十几年。这一企业是我亲手建起来的。我的同事们对企业、对我这个头儿都了如指掌。我们在一点上看法完全一致，那就是：企业里的气氛很好。

回家的路上我跟面包师道声早安，买些小面包当早点，将近8点时吃早饭。接下来是一般性的办公室工作，与顾客洽谈，参观建筑工地，等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就可以“下班”了。相反，日程表上安排的是瓦尔德霍夫俱乐部队，他们在路德维希港训练。晚上从俱乐部回到家中后，我和妻子还得花两三个小时处理白天搁置下来的工作。

确实是漫长的一天。但使我满意的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各尽所能，我妻子、福尔克，还有二儿子乌韦，只要在家，他也帮着干。他已经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正在普福尔茨海姆跟一个金饰匠当学徒。

光这些事情就已经排满了我的时间表，但我还有其他工作，比如星期一晚上6点半在路德维希港的一家有线电视上主持一个短小的体育节目，我和我的同事于尔根·席克主要负责处理本地区球赛及电视观众的电话，还要讲解、

答问，然后是评论和介绍信息。我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有时还需要消除误会。

除了电视台的工作，还有另外一项任务：为体育爱好者、青年队教练、城市青年团体、地方政治家和“青年奥林匹克训练中心”作报告。我也常去看少年儿童在学校和假期的球赛。我主要用星期一（有时加上星期三）去完成这些附属工作，但我从不把这些事情看作是次要的。

经常有人问起我：有这么多的活动安排，哪里还有时间用于家庭和业余生活呢？首先我想说明一点：我从不把家庭看作业余爱好，我是个积极的家庭成员。如果谈到业余爱好，对我来说那就是旅行、打猎，到大自然去。大自然，森林、小溪、河湖、山谷，对我来讲，永远令人难忘。

我对打猎的理解绝不是在山林中到处放枪。我认为保护动物是最高法则。当然，击中一些病弱的小动物是不可避免的。当我猎获了其中一只，我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的战利品对于生物种群是有利的。

雏鸭、山鹑、野鸡、狍子、小野猪、兔子和大耳狐，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这些动物，因为施拉普纳家族世代都喜欢打猎，一种褒义的狩猎：为动物设饮水处，冬天喂养和照料受伤的动物，当然还包括驯兽。干这些活儿虽然很累，但往往被观赏这些野兽，尤其是幼兽那无拘无束的可爱形态中体验的快乐抵消了。这对我的家庭和我自己是一件大事。

打猎和旅行是两件相似的事，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

我的旅行生活并不是懒洋洋地晒太阳，晒脱一层皮，而是要细致地观赏，获得印象，并把新鲜的经历带回家里。这些对我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不论是观看世界杯比赛、奥运会——我的头等大事——，还是了解异族文化，都是我难以忘怀的经历，令我长久地品味。这些经历总会使我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

我对非洲的民风、自然和动物很感兴趣。当北美的现代化、高科技及雄伟的气势几乎使我倾倒时，我也从中国带回了两千年古老文化的印象。欧洲也有一些好去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瑞士、奥地利、蒂罗尔（奥地利一州）。在那儿打猎时我曾兴奋地越过围栏（弗兰茨·克拉默肯定会吓得掉过脸去，但我喜欢这样），那儿的山区令人心旷神怡。另外，我想顺便提一下，我非常尊敬那些山区的人们，他们生活大都不富裕。

我虽然经常在国内外国旅行，但我还是很愿意呆在家里，因为好东西近在咫尺。库普法尔茨是重要的工业基地，但也不乏美丽的景色。库普法尔茨人的勤劳和平易使我在这儿有强烈的家乡自豪之情。

巴伐利亚的人民和风景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只因为我曾与瓦尔德霍夫队一起使拜仁慕尼黑队受挫，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喜欢巴伐利亚人善于在喝啤酒时平静地解决问题，他们把有些事情看得很淡，从不渲染夸张，这一点莱茵兰人就做不到。

还是让我们回到北美洲吧。正因为这里的高效率体育

活动与其他职业有相似之处，因此有些事情之间是可以比较的。这儿的职业俱乐部里关于酬金和上下关系的讨论与经济界没什么不同。在这里，体育和普通企业一样，也有各种机会。理所当然，我会很有兴趣在这里窥视一斑，了解一下这一地区的体育、娱乐、文化和工业状况。1981年，我有一次了解到北美球迷的表现、新闻媒介的工作及新闻界对体育俱乐部和比赛组织者的看法。这可以说是用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窃取信息。各种协会为每个家庭成员提供各种节目，进行详细的咨询，吸收最好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美国人懂得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介。

那次访问之后，我更喜爱新闻传播技术了。不管是办报纸、出书还是制作电视节目，都具有无穷魅力，所以我与当地的闭路电视台过往甚密也是不难理解的，这样我可以在屏幕前后体会和学到很多东西。

我想现在是自我介绍一下的时候了。我1940年5月22日出生于库普法尔茨的兰佩特海姆，在防空洞和地下掩蔽所里迈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1946年的一天，我父亲从战场归来，我正在院子里踢球。当然我还不认识他，我跑去问别人：“这人是谁？”

他并没有生我的气。他看上去可怜兮兮的，和许多其他士兵一样患了水肿病，一个40岁的男人，体重只剩下45公斤——这幅画面我永远也忘不了。

在国民小学、实科中学和商校毕业之后，我开始了电气装修工的学徒生活，学徒结束时要通过满师考试。上学时，

我常在假期打零工，挣些零花钱。有时候是在农场，有时在工厂或企业，有时又做司机副手，总之，哪一行都干过。

1961年1月，我开始去服兵役。1962年脱下军装，不久就开始在父亲所有的一块土地上盖房子。1963年8月住进了新房。这期间我一直在做电气装修工，总共干了7年。要说这活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有发言权。

房子盖好了，接下来就是结婚。1964年生下长子福尔克，1年以后乌韦来到人世，1969年是克劳蒂娅出生。那时候，不分平日还是周末，我一天总要工作8个、12个、有时甚至16个小时，以偿还所有的债务，还要养家糊口。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对自己取得的一切感到骄傲和满足。

当然，服完基础兵役以后，有时还得参加军事训练。1966年到1967年我还通过了猎手考核，1968年到1969年达到了猎手技师级。

我也曾问过政治，那时候我对很多事情还不大懂。1967年，兰佩特海姆的国家民主党推举我这个政治上相当固执己见的人为候选人，我当时想，这回硬着头皮也得往墙上撞。长辈们、我父亲和其他家人都劝我，但我拒绝了，我总是自发地、直截了当地、往往不多加考虑就作出决定。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开了窍，我对自己说：撒手吧，你并不懂这一行，让那些皮更厚、更精通此道的人去搞政治吧。这一段热衷政治的日子里，虽然也曾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我至今仍与所有的政治“对手”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段短短的政治生涯并没有破坏我们的友谊。

在我的生活中，本行职业和体育一直并行不悖。作为电气装修工的我一直在努力拿到技师证。这一目标实现后，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自己办一个企业。在这一点上，我妻子斩钉截铁的肯定回答比我向往在经济自立门户起到更大的作用，最终也是她挑起了最重的担子，家庭和孩子。我们终于在1970年办起了一个企业。我们有3个满师徒工，3个学徒，我做师傅，我妻子在办公室，这对她来讲已经是相当重的负担了。

当时我的考虑就是，先让我妻子，然后再让全家都来参加这个企业的工作。这些年里可以说，大家都被调动起来。一开始我们就使用了一些特殊的技术如螺旋升降机提供服务，但企业没有马上见效。1971年起，有些城市、乡镇和供电公司开始接受我们的技术服务，这样我们才一步步发展起来。现在我和这些单位签订了长期合同。我们的优势是：用我们的机器可以达到15至18米的高度，这样就可以为街道、停车场以及高层建筑物安装照明设备、进行修缮和清洗工作。

1970年我在毕普利斯又开了个新厂，1年后在那儿买下一幢房子，成为我常住的第二居所。我这样做有其道理。在毕普利斯没有真正的电工，而我的家乡兰佩特海姆却拥有许多家传的公司，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到了1986年，我在车间和办公室聘用了12个人。工作量不小，但总能给大家留出空余时间去享受生活的另一面。“工作紧张”对我们来说只是道听途说之辞，而不是亲身体验。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理所当然地，我从年轻时就开始在我的家乡兰佩特海姆的足球俱乐部踢球，以后又去了路德维希港，在那儿当业余和合同球员，先在凤凰队，接着在西南队。我在一个业余队为比尔施塔特效力，从此，踢球的级别越来越低：丙级队、丁级队，最后是成人组最低的戊级队。我这么做是因为既不愿失去与足球的联系，也不想因健康原因而完全中断我的足球生涯。另外，我还需要一种消遣来消除每日工作的疲劳。

1968年，我接替了一个丙级青年队教练的职位——循序渐进，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这样从零开始。接下来我又历任青年队A组，1971年在成年队，1972至1977年任戊级队教练及指导，在一个丁级队任领队。1974年获乙级教练证书，1976年在海德哥特获甲级教练证书，1979年至1980年在科隆体育学院获足球教师证书，在海德哥特也得此证书。

这一段日子我累得精疲力尽，不光要照顾生意、家庭和对付接踵而来的考试，我当时还在达姆施塔特队任洛塔尔·布赫曼的副手。1977至1978年我们的“百合队”（达姆施塔特队的绰号）一举夺魁，进入联邦足球甲级队。1979年我独自任教练，因为布赫曼已卸职。

虽然我们在赛季的最后7场比赛中赢得了可观的6分，但这也救不了达姆施塔特98队的命运，该队和原来的冠军队纽伦堡第一俱乐部队一起失去了甲级队的位置。虽然它以德国足球元老的身份或许还可保留名声，但这也并不

足以使人感到慰藉。赛季过后我又开始了三点一线的生活：本行工作、科隆的学业和达姆施塔特队的助理教练。接下来在瓦尔德霍夫俱乐部队执教，这个队是在1982—1983年赛季升为联邦甲级队的，至1988年地位稳固。

在体育学院里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我要学习和消化所学的知识，还得写出论文，简直忙得焦头烂额。1969年最后一次电工技师考试结束后，我再也没有上过学。因此我用两个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才入了门，而且大多数课程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如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方法学、解剖学等。我必须通过听大课熟悉这些内容。

我把老师讲的东西都记下来，否则我什么都记不住。结果搞得一屋子都是纸条。周末，妻子把所有的纸条放在打字机旁，工整地打出来，使我可以清清楚楚地阅读，专心致志地翻检。两个多月以后，我的脑子终于清晰起来，我开始入了门，可以在课堂上当堂消化教材，能够做到老师或者说“考试”所要求的那样，举一反三。

最后我终于成功地通过考试，同时在与曼海姆瓦尔德霍夫俱乐部的合同上签了字，毫不费力地从大学体育理论过渡到职业足球的实践当中。

在我的足球教练生涯中，最使我骄傲和光荣的是获得泽普·赫贝格奖。上一届赫贝格奖得主是迪特利希·魏泽，他于1983年获此殊荣。我下面一届奖杯被国际足坛上名声很大的德特马·克雷默捧走。我在库普法尔茨报界领奖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像令人难忘的德国队前教练泽